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2.03.013

【主持人语】在中国南方形成的以士大夫为模特儿,史称“秀骨清相”的佛教艺术风格,自北魏孝文帝南迁洛都营造龙门石窟以来,成为影响北朝佛教美术的主要源头。尽管这一时期的古印度佛教艺术仍然对中国持续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造像题材、形式、仪轨、庄严等方面在中国的传播,而艺术风格和表达程式远远不及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玄学的南朝美术式样,郭建设研究员《太行山南麓几处石窟与摩崖石刻及相关问题》对此予以详细讨论。对中国北朝佛教产生巨大影响的另一源头是古印度的笈多艺术,张同标博士《西印度考察所见舍卫城大神变佛教造像十例》就讨论了古印度笈多佛教艺术中的舍卫城大神变题材,并由此发现中国佛教美术中诸如莲花座、净土变相、千佛等造像类型的古印度渊源,这是中国学者对该话题的首次系统研究。另外,余咏芳博士《析秦家懿多元主义的宗教观》对加拿大华裔学者秦家懿的宗教观进行了细致梳理和界定,在秦氏观点的转述和阐释当中,一直争辩不休的“关于中国是否有宗教”的话题得到很好地辨析与理解。

太行山南麓几处石窟与摩崖石刻及相关问题

郭建设

(河南焦作市博物馆,河南 焦作,454150)

[摘要]位于太行山南麓的河南省焦作市,佛教历史源远流长,基础深厚,在北魏隋唐时期,是平城与洛都、洛阳与邙城的重要通道。该地区青天河摩崖线刻观音经像、悬谷山太平寺石窟及摩崖造像和石佛滩摩崖石刻造像三处佛教遗迹,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对研究西域和中原佛教艺术的融合与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石窟;刻经;古丹道;观音;千佛;药师佛

[中图分类号]B925;J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2)03-0057-11

Several Grottos at the Southern Foot of Taihang Mountains and Cliff Rock Inscriptions and other Related Issues

GUO Jianshe

Museum of Jiaozuo City, Jiaozuo Henan, 454150 China)

Abstract: Jiaozuo City, located at the southern foot of Taihang Mountains in Henan Province, has a long history and deep foundation of Buddhism. During the Northern Wei, Sui and Tang dynasties, here was an important transportation channel between Ping Cheng and Luo Du, Luoyang and Ye Cheng. Its three most famous Buddhist relics, namely the cliff rock inscriptions of Guanyin Scripture in Qingtianhe, the Taiping Temple grottos and cliff rock statues in Xuangu Mountain, the cliff rock inscriptions and statues in Shifo Beach, have significant historical value, especially for researching the fusion and exchange of Buddhist art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of China.

Key words: grottos; engraved scripture; Guanyin; Thousand Buddha; Medicine Buddha

位于太行山南麓的河南省焦作市,是古代著名的三河(河内、河东、河南)地区之一。即河内地区,亦谓、怀州、怀庆等,素有“河朔名邦”之称。历来为

豫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该地区佛教源远流长,基础深厚。西晋时河内高僧帛法祖“才思俊彻,敏朗绝伦,日诵经八九千

收稿日期:2012-03-10

作者简介:郭建设(1953-),男,河南焦作人,河南焦作市博物馆研究馆员,主要从事佛教文化艺术研究。

言,常以讲习为业,信奉其德业者,数以千计”。^{[1]26}后赵佛图澄曾在洛阳、邺城、河内一带活动,焦作东邻的辉县市鸭口村北悬崖间有“千佛洞”遗迹,传为佛图澄创建的玄极寺。^[2]从学于鸠摩罗什的后秦河内名僧僧业,擅长《十诵律》,被罗什赞为“后世之优波离”。^{[3]429}特别是北齐著名僧人僧稠,长期活动在豫西北一带,今焦作修武百家岩寺为僧稠创建,寺西有其诵经坐禅的石窟“稠禅师庵”遗迹等。古河内地区佛教石窟文化与周边地区联系也很密切。其北倚太行,沿轵关陁、太行陁和古丹道穿越群山起伏、峰峦叠嶂的三晋大地,可达北魏故都平城,沿线羊头山、天龙山及云冈等石窟历历在目;南面黄河,越河而南即是著名的洛阳龙门和巩县石窟;东连太行山东麓,与邺城南北响堂山石窟、安阳石窟群等相衔接。

北魏隋唐时期,皇室多尊奉佛教。河内地区由于是平城与洛都、洛阳与邺城之间的重要通道。尽管不能与洛阳和邺都寺院林立,僧尼万众的规模相比,但由于深受帝都佛教崇尚之风的影响,该地同样凿窟刻石,建寺塑像,信众如潮,崇教之风日盛。一些佛教石窟遗迹至今犹存,如博爱青天河北魏摩崖线刻观音经像、焦作市山门河口北魏佛龕遗迹、焦作龙洞南岭摩崖石刻造像、济源白涧口唐代摩崖石刻造像、沁阳悬谷山太平寺石窟及摩崖造像、修武西村淹井河隋代摩崖石刻、博爱石佛滩隋唐摩崖石刻造像等。今就博爱青天河北魏摩崖线刻观音经像、沁阳悬谷山太平寺石窟及摩崖造像和博爱石佛滩隋唐摩崖造像等三处佛教石窟(摩崖石刻)遗存及相关问题进行一些初步探析。

一 石窟和摩崖石刻遗迹概述

(一) 博爱青天河北魏摩崖线刻观音经像

青天河摩崖北魏观音经像,位于博爱县青天河风景名胜区内之二空山山腰间,该山高约180米,宽约100米,整座山峰酷似一尊端坐的大佛。当地人称此山为菩萨岭,其悬崖如壁,山下为涛涛丹水,地势十分险峻。(图1)20世纪70年代,博爱县文物部门在丹河峡谷内进行文物调查时,发现一处北魏永平二年(509)刊造的摩崖线刻观音经像。(图2)2002年,罗哲文、李福顺等先生考察后,给予高度评价。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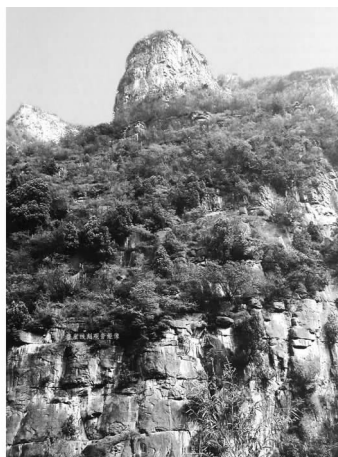


图1 青天河风景区菩萨岭天然大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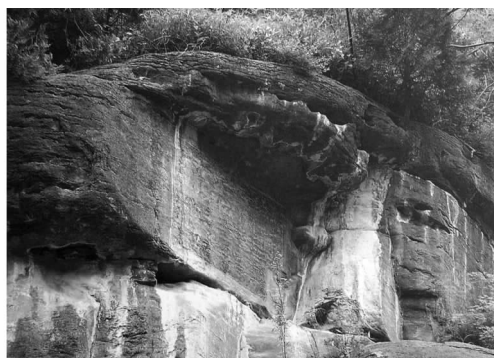


图2 悬崖峭壁上的北魏摩崖线刻观音经像



图3 北魏摩崖线刻观音经像拓片

该石刻面积约2平方米,中间线刻一观世音菩萨像,两侧刻录《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第二十四》。(图3)线刻观世音菩萨图像,刀法流畅,线条劲挺有力,刻工精熟老道。观世音菩萨图像人物体形修长,头戴花蔓冠,冠中刻一饰莲瓣形背光的立佛。冠两边的宝缙向两侧平伸折角呈S形下飘。面相方正,向右微侧,有八字形胡须。颈佩桃形项饰,两肩部佩圆形饰物。宽大的帔帛绕肩在腹前穿璧环下垂至膝际后上扬,一条穿左肘形成环形后回绕沿体侧下垂,一条绕右臂向外飘扬。左手持忍冬荷叶屈肘于左胸前,右手执莲茎下垂,两腕均戴手镯。

下着长裙,跣足立于覆莲座上,脚趾向外。身后有圆形头光和莲瓣形背光。上有帔幔装饰的方形华盖,华盖四角饰山花蕉叶和下垂的幡带。

线刻观世音菩萨图像之左刻《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第廿四》序首以及修丹道的经过,正书,10行,行10至39字不等;右刻参与施工的军队将领名单等。保存完好,全文共432字。录文如下:

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第廿四

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佛弟子清信士建等,庸软忝处朝末,猥蒙所遣,通治丹道卅二难,从南至北,造作垂论。会遇此难,其侧有自然石堪可造灵容,遂发微心,刊造观世音像一区,并注观世音经序首一启。欲令路人憩息之暇,因生礼诵,敬拜赞读,靡不感悟。经云:“福不唐捐”,可谓妙旨之明验。后愿斯道坚固,永无亏损,使行士驰途坦然无碍,所愿如是。其道以大魏永平元年冬十有一月建,功至二年春二月成讫。凡用夫四千,其日九旬。

南无观世音菩萨消伏一切毒害,行人见者亦发菩提心。

厉威将军、覆津太守、监治道都将、员外将军、都副将、武功苏建。大魏永平二年春二月造。

长史赵郡李雍、司马勃海高成、主簿兼长史间茂、长史汝南周祐。

司马新平冯珍、主簿带军主广平司空湛、当此难军主赵郡刘运

军主颍川郡郭龙远、匠潘惠孙造、军副韩道遵、幢主张俱罗

兼主簿令史索猛、主簿领令史姜达、军副令史贾显、军副令史王万兴、军副令史李标、军副令史郭达、军主令史田显

该石刻文体略带隶书遗韵,刀锋犀利,字形隽秀,为流传魏碑之上品。

(二)沁阳悬谷山窄涧谷太平寺石窟及摩崖造像

窄涧谷太平寺石窟及摩崖造像,位于河南省沁

阳市西北20公里太行山南麓的神农山主峰西侧,当地人俗称此处为悬谷山。山下一涧平地而起,以3米隙地蜿蜒曲折北上,两侧峭壁悬崖,奇石嶙峋,林木繁茂,溪流潺潺,人曰“窄涧”。行至海拔500米时,豁然开朗,一个宽约50米的平坦谷地,成为窄涧谷的终端。石窟处在整个山体为石灰岩抱持的半山腰上。悬谷山窄涧谷石窟摩崖石刻造像计有造像龕6个,千佛洞1个,摩崖题记8处,线刻佛塔1处等,分布在沿山壁长约160米的范围内。

1. 造像龕

造像龕自西向东分别为1至6号。一号龕位于最西端,近正方形,龕高145、宽143厘米,内雕一佛二菩萨,主尊善跏趺坐在方形台基上,两侧菩萨双手合掌于胸前,站立于莲台之上。二号龕位于1号龕东约8米,为一边长90厘米的方龕,内雕一佛二菩萨,主佛为阿弥陀佛,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两侧为观世音和大势至。(图4)三号龕是该区造像龕中最大者,龕高338厘米,宽126厘米,内雕一佛立于莲座之上,佛右手斜持锡杖,杖端雕一坐佛,左手托药钵,应为药师佛。(图5)龕右上方有唐咸通二年(861)造像题记一方,名为《药师像赞并序》,由邑人乡贡明经郭崧书丹。结合清《河内县志》和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六十三《窄涧谷石刻三段》有关记载,录文如下:“粤有东方去此佛刹十恒河沙彼国,大师厥号药师琉璃光如来经云:以白银琉璃为地,宫殿楼阁,悉□七宝,亦如西方无量寿国,无有□也。此药师琉璃光本所修行菩萨道时,发心自誓行十二微妙,上□令一切众生所求,皆得慈如是。崧□思火宅之难,想无依倚,遂说喻乡人,恃凭内典,顿悟迷津,迺相诱化,至成结愿。方会无上之因,各以舍财不悛。与道齐通,迴心坚贞,奔驰于此,立召良工,雕磨斯像,使信士等日加精勤,时无懈怠,用工计日备矣。庄严具相,真如恩布之容。礼者福利无疆,念者祸灾永灭。自兹恳愿,愿国祚永远,朝贤无缺,元戎布德,泽润生灵,牧宰常安,人民鼓腹,龙神后稷,潜佐人天,风调雨顺,国泰联绵,施主邑人等生生值佛世,往往唯闻解脱音,德垂后裔,令望古今,乃祖乃父,世笃忠贞,子子孙孙,引无极也。复愿幽冥先亡,早离三途,内外姻亲,咸登法会。时属咸通贰载岁临辛巳九月壬申十五日丙戌,用表成功,以明著

矣。洞彻空宗,志谓斯文。”四、五号龕为并列双龕,两龕规格相同,通宽136厘米,高60厘米,中间隔以14厘米宽的界限,均为五尊式造像。四号龕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号龕内雕一佛二菩萨二力士。(图6)两龕风格一致,系同时开凿。双龕下方有一造像题记,为唐大历九年(774)所刻。六号龕为莲花形,龕顶中央作尖拱状,最高处155厘米,龕上宽107厘米,下宽125厘米,内雕一佛二菩萨,主佛高130厘米,善跏趺坐于须弥座上,右手握拳,左手扶膝,双足踏于莲花之上,似为弥勒佛。佛两侧菩萨分立左右,双手合掌于胸前,跣足站立于莲花之上,佛与菩萨足下的莲花之间有莲梗相连。(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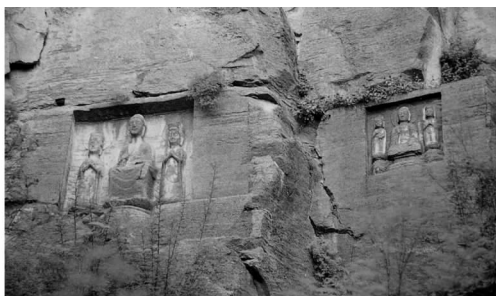


图4 悬谷山太平寺摩崖造像一号龕和二号龕



图5 悬谷山太平寺药师佛造像



图6 悬谷山太平寺摩崖造像五号龕



图7 悬谷山太平寺摩崖造像六号龕

2. 千佛洞

千佛洞位于摩崖造像区的中部。洞口南向,东西宽280厘米,南北深230厘米,中心高约220厘米,穹窿顶。北、东、西壁下部各雕一佛龕。正面(北壁)靠下部佛龕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造像,头像俱毁,主佛结跏趺坐于束腰莲座之上。东壁下部佛龕内雕一佛二菩萨,佛龕风化严重。(图8)西壁保存较为完整,下部位置佛龕内雕一佛二菩萨。主佛身着袈裟,内着僧祇支,右手上抬,施无畏印,左手置左腿上部,结跏趺坐于束腰莲座之上,头顶为桃形头光。左胁侍面部端庄秀丽,颈饰项链,双肩下披长带,着素裙,右手前持莲朵,左手下提净瓶,双足立于仰莲座上,桃形头光;右胁侍除左手前持莲朵,右手下提净瓶外,余同左胁侍。南壁下部未雕佛龕。(图9)四壁除下部佛龕外,空余壁面用同一规格整齐的雕出千佛图像。千佛的每个佛龕壁面高约10厘米,宽8厘米,着通肩式大衣,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莲座之上。每个小佛龕的立颊上均刻出佛名,四壁共雕小佛像龕1251尊。可见残存部分佛名有:北壁:极高德佛、功德佛、德河佛、□光明佛、高山佛、善定□佛、坚□佛、坚現佛、住法佛、天德佛、法章佛、石虚殿佛、难施佛、太光□佛、德势力佛、采菩提佛、电明佛、月光佛、子光佛、狮子想佛、上利佛、人德佛、邮罗延佛、大音佛、极高佛、施明佛、老月佛、全家成佛、善师名佛、珠足佛、妙身佛……。东壁:无忧佛、无量佛、月□佛、身著佛、不□佛、□负佛、龙手佛、师□佛、德人佛、见面佛、净泝佛、名德佛、实□佛……。南壁:宝师佛、施礼佛、滌义佛、随日佛、师为乐佛、破怨贼佛、觉德华佛、增益佛、弥楼明佛、甘露主佛、有家灭佛、大慈佛、爱明

佛、无量佛、清净佛、实多佛、土节佛、香明佛、药师佛、叶明佛、梵名佛、如众王佛、罗睺月佛、福保明佛……。西壁:如王佛、华池佛、善良佛、扎楼佛、师子佛、庄严河佛、最上佛、慧国佛、金须佛、端庄佛、妙音佛、华积佛、天光佛、慧华佛、智藏佛、上接佛、法乐佛、罗佛、甘露明佛、善手佛、羽材日佛、名间佛、势法佛……。(图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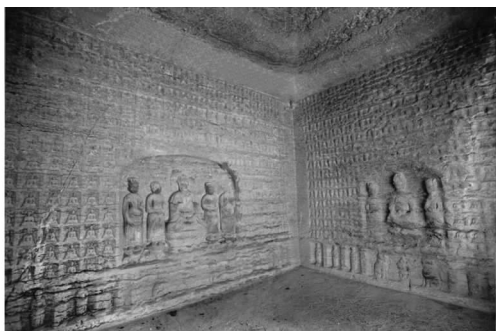


图 8 悬谷山太平寺千佛洞北壁和东壁

在四壁千佛和佛龕之下,均留出一段高约 30 厘米的空间,分别雕出弟子、护法狮、熏炉等。计有弟子 25 躯,像旁有题名,因石刻多风化,隐约可见“佛垂灭度以诸法藏付大迦叶”、“难”、“睺罗”、“次付口伽难提”、“次付霍勒”、“次付师子比丘”等。(图 11)



图 9 悬谷山太平寺千佛洞西壁和南壁



图 10 悬谷山太平寺千佛洞千佛图像(局部)



图 11 悬谷山太平寺千佛洞南壁弟子造像(局部)

3. 线刻唐塔

线刻佛塔位于四、五号双龕与六号龕之间的崖壁上。该塔为粗线阴刻,线刻佛塔通高 303 厘米,下部塔身高 130 厘米,塔身上部正中位置刻一圆拱形龕,龕内雕像已不清晰,龕楣上部从正中分别向两侧立颊各雕一条降龙,龕高 90 厘米,宽 60 厘米。塔身之上有 10 层叠涩檐,最宽一层两端各刻出一个风铎。檐部正中有“唐故口大和尚肃公影塔铭”题记。(图 12)该线刻佛塔应为肃然禅师的影塔。肃然,原为河内县龙兴寺的僧人,因遭安史之乱,发誓“不坐禅房,不食常住”,来到窄涧谷太平寺千佛岩下,凿窟而居(三号龕东侧 2 米处有其禅房洞窟遗迹)。石窟中一般多见浮雕塔形,如云冈、龙门石窟,在佛龕两旁浮雕塔形,作为石窟造像的一部分,也反映了当时佛塔建筑的实体。该遗址中用线刻表现出如此之大的塔形,较为少见。

关于悬谷山太平寺及千佛洞的年代。千佛洞造像多为隋代特征。^[3]然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六十三《窄涧谷石刻三段》《僧肃然造像记》有“此窄涧谷,古魏太平寺千佛岩下……”等记载。《河内县志·金石》也载此处有“大隋皇帝”、“旧置伽兰之所,寺号太平”、“千佛堂”等语。在距千佛洞很近的崖壁上有一方刻于唐建中元年(780)的题记,名为《唐窄涧谷僧肃然造像记》,录文提到肃然禅师于唐大历二年(767)发愿出家于“千佛岩下,住经十四年”等语。在四、五号双龕下方刻于唐大历九年(774)的造像题记中也提及有“千佛岩”等。因此,有学者认为该“石窟开凿于悬谷山南的窄涧谷侧。在北魏及东魏时,有太平寺千佛岩之称”,千佛洞“三壁三龕,又刻千佛,当作于北魏末至北齐年间”。^[4]根据文献有关记载及遗存情况。推

测千佛洞至迟凿于隋前期或更早。隋代之前此处已“旧置伽兰之所”,即“寺号太平”的太平寺,先后易名悬谷寺、开化寺、真谷寺等。隋唐是该石窟的发展鼎盛阶段,以后历代开发,形成现之规模。



图 12 悬谷山太平寺线刻唐塔

(三)博爱石佛滩隋唐摩崖造像

石佛滩摩崖造像位于博爱县许良镇下伏头村丹河口东岸的石灰岩山崖上,崖下为丹河及享誉古今的古丹道。摩崖造像均开凿在陡直的悬崖峭壁上,南北长 60 米,高约 20 米。自北而南分为三个区,共 59 个龕,其中隋代龕像 55 个,唐代 3 个,年代不明 1 个。各种造像 78 尊,造像题记 10 方。所有龕像均为浅浮雕,最大者高 110 厘米,宽 66 厘米,最小者高 24 厘米,宽 20 厘米,龕像深度一般在 4 厘米至 18 厘米之间。^[5](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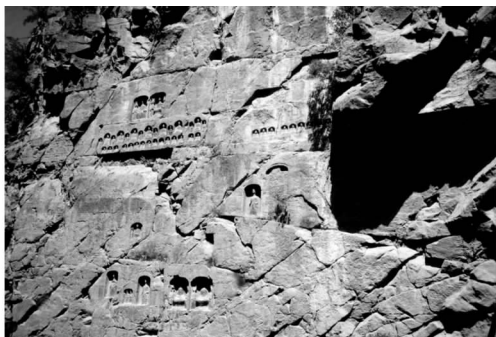


图 13 石佛滩隋唐摩崖造像

一区:位居造像区北端,下部接近水面。龕像均为一佛二菩萨造像,绝大部分保存较好。5 个龕像分上下两层开凿。龕的形制、规格均相同。长方形圆拱龕,浅浮雕尖拱形龕楣。上饰莲花三朵,花中心有花蕊向下伸出,立颊雕作宝珠束莲柱式。这一区有两方题记,其中一方题记为“大隋大业十二年……为皇帝陛下造弥勒两铺”等内容。

二区:在一区之南 12.8 米,计有 50 个龕像,分六层雕造。形制有并列的双龕、成排的单龕及几个未凿毕的龕。大龕采用较多的是长方形圆拱龕,阴线刻尖拱形龕楣,楣饰莲花与忍冬。龕楣装饰有 2 处最为精美,不仅楣额外饰盛开莲花,涡角饰宽大的三叶式忍冬纹,尖拱处又有石榴花与忍冬纹组成的点缀图案。其造像内容丰富,有一佛二菩萨的三身龕,单身佛龕,还有单身菩萨像龕。(图 14)据题记内容可知,题材有弥勒佛,阿弥陀佛、观世音等。有造像年代的题记如“大隋大业十一年四月八日”、“大业十一年岁在乙亥”、“大业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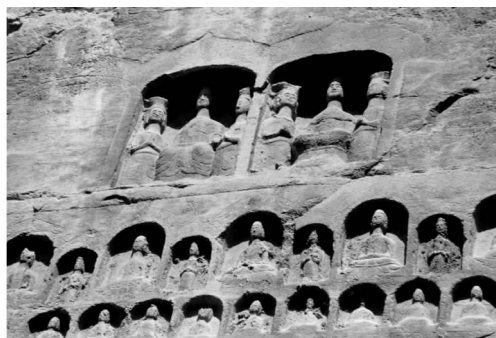


图 14 石佛滩隋唐摩崖造像二区(局部)

三区:在崖壁最南端的河桥处,与二区相距 25.8 米。多为唐代龕像。据当地群众反映,该区龕像原有四五十个,在 20 世纪 50 年代修渠筑路时被炸掉,今仅存 4 龕,有圆龕和方拱龕两种。

二 相关问题探析

(一)古丹道及永平二年的丹道修治工程

北魏青天河摩崖观音经像中记载了古丹道的修治情况。丹道因丹河而名,丹河发源于山西的高平市,《水经注》称之为丹溪、丹水等。古丹道在丹河峡谷内长约 40 公里,以山峻道险而著称,是当时晋豫交通要冲。古丹道北通山西上党,东接华北平原,南经孟津渡口进入伊洛平原到达都城洛阳,是北魏时洛阳通往平城的重要道路之一。现古丹道遗迹可大致分为三个地段,从丹河出山口向北至青天河水库北侧为第一段。该段主要位于丹河西岸,现保存有部分道路,在沁阳九渡村尚保存有一个宋代寨堡,大部分古道分别被现代道路,水渠,水库所破坏。第二段从青天河水库北侧至豫晋交界处,此段道路跨越丹河东西两侧,现存有坂道和北魏摩崖题刻。第三段开始脱离丹谷向东北方向,攀山脊,越山谷至柳树口(今山西晋城市东南),从柳树口向西北,可达山西晋城市。^[6]

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将都城从山西平城迁到洛阳后,太行山南麓的太行陁和古丹道就成为北接晋地、南通洛阳的交通要道。由洛阳向北,经豫北河内地区,走太行陁或古丹道可达山西泽州、长平、太原、平城等地。然太行陁道路崎曲,行走艰难,且位于山脊之上。汉建安十一年(206)冬,曹操北征高干时所作著名的《苦寒行》,诗中描写盘旋曲折的“羊肠坂”即为太行陁在此处最险要的路段。《水经注》中也记载有古丹道载体丹河峡谷的险峻:“丹河又东南历西岩下,岩下大泉涌发,洪流巨输,渊深不测。”保证该要道的畅顺,从而有利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及交通运输,对北魏统治者来说,自然是十分重要的。观音经像中记载古丹道的这次修筑,即为开凿维修古丹道的重大工程之一。

关于此次修治丹道的情况,造像记中有较详细的记载:“通治丹道卅二难,从南至北,造作垂讫。会遇此难,其侧有自然石堪,可造灵容。其道以大魏永平元年冬十有一月建功,至二年春二月成讫。凡用夫四千,其日九旬。”“通治丹道卅二难”,应是修筑丹道中的32处较大的工程,工程动用4千兵士,时跨两个年段,计90天。可见这是一次较大的古丹道修筑工程,工程的最北端,应在北魏摩崖造像附近。由于丹河峡谷地势险峻,施工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因此,修筑丹道的最高将领苏建在丹道“造作垂讫”,完成最后一段工程,即三十二难之最后一难时,利用菩萨岭这一自然石堪,选择观音菩萨“灵容”造像并雕刻了《妙法莲华经普门品》,“欲令路人憩息之暇”,“礼颂”“敬拜”,祈愿“斯道艰固,永无亏损,使行士驰途坦然无碍。”

(二)《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第二十四》刻经发现的意义及观音信仰

青天河摩崖刻经刻出了《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第二十四》的卷首部分,这是目前发现有确切纪年的时代最早的同类刻经。

《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是初期大乘佛教的代表性经典之一。今存最早的译本,当为西晋武帝太康七年(286)竺法护在洛阳译出的《正法华经》十卷二十七品。由鸠摩罗什于姚秦弘始八年(406)译出的版本为七卷二十八品,是当时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译本。罗什译本最初的内容是七卷二十七品,而且其中的《普门品》没有重诵偈。后人将法献同达摩提合译的《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第十二和阇那崛多译的《普门品偈》收入罗什

译本,其后又将玄奘的《药王菩萨咒》一起编入,构成现行流通本七卷二十八品的内容。隋仁寿元年(601),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二法师在罗什本的基础上,重勘梵本,名为《添品妙法莲花经》,共七卷二十七品。^[7]

类似的《普门品》刻石目前发现的还有一些。如邯郸南响堂山第4窟北齐天统元年(565)刊刻的《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涉县娲皇宫石窟北窟北侧崖面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节文;涉县木井寺北齐武平二年(571)《七级石浮图观音经碑》刻《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同地北齐武平四年(573)《石垂教经之碑》碑阴刻的《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8]以上几处刻经与青天河北魏摩崖刻经年代较为接近。一般来讲,西晋十六国时期,主要流行竺法护所译的《光世音普门品》,南北朝至隋代,主要流行罗什译本。^[9]上述《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刻经,依时代先后而言,青天河摩崖刻经石刻为最早,应与《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的原始译本最为接近。

自西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后,观世音信仰便开始在民间广泛流行,遂形成一种深厚的观音文化。观世音,又名光世音、观自在、观音等。是大乘佛教中的十地菩萨,也是完美的慈悲化身。他能随类应化,以33种不同形象,为众说法,救苦救难。观世音信仰的修行方法也较为简炼。在《普门品》中,通过佛世尊之口宣说,当众生遭遇困难之时,只要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就能脱离“七难”(火、水、风、刀杖、鬼、枷锁、怨贼)、“三毒”(贪、嗔、痴)之苦,并能满足“二求”(求男、求女)的愿望。还出现了许多观音菩萨救苦救难的灵验故事和专门讲述这类灵验的集册等。这在政治分裂、连年战争、民不聊生的南北朝时期,正好抚慰生活在动荡不安中的百姓心灵,奠定了观世音菩萨帮助世人解除现世生活中各种苦难和灾祸的功能定位。^[10]“以像设教”是佛教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在北魏出现了大量的观世音造像。现存最早的观世音造像是甘肃永靖炳灵寺169窟北壁第六龕内塑造的一佛二菩萨像,旁有墨书“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得大势志菩萨”和“建弘元年”榜题。此时的观世音造像是以协侍菩萨身份出现。距博爱麦青天河摩崖刻经不远的龙门石窟中,由观音崇拜而启龕造像者也很多。仅刊刻确切纪年的观音造像就有78尊,其中北魏13尊、东魏1尊、隋1尊、唐(包括武周)64尊、后梁1尊。^[11]龙门最早的

观音造像见于古阳洞北壁,即《清信女宋温鸯造像记》,该造像有“永平二年四月廿三日造观世音像一区,上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因缘眷属,愿弟子愿愿从心,所向无难。清信女宋温鸯”的题记,时代略晚于“大魏永平二年春二月造”的青天河摩崖观音线刻图。此外,还有许多北魏观世音金铜造像,仅《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就收录北魏观世音造像20余尊,多为立像。^[12]

永平年间这一支由北魏军队高级将领统率的队伍,因一项重大工程竣工而发愿为观世音造像的情况,较为少见,这也充分证明当时观世音信仰的广泛程度和社会基础。

(三) 观音经像中菩萨的造型特点

青天河摩崖线刻观音经像中的菩萨形像呈现出一种“秀骨清像”的风格。

所谓“秀骨清像”,是由东晋顾恺之、戴逵和刘宋陆探微创立的一种佛画式样,其特征为面相清瘦,细颈削肩,体态修长,风度潇洒。顾氏是当时的名士,更是代表性画家,他在绘画上成名很早,以“刻削为容仪”,二十岁左右就在瓦棺寺描绘“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的维摩诘像。戴逵也是时尚清谈玄学的典型人物,善绘画与雕塑,《历代名画记》记载其“善铸佛像及雕刻,曾造无量寿木像,高丈六,并菩萨”。陆探微作画的艺术风格与顾恺之相近,《历代名画记》评之为:“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焉,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应该说,晋宋时期“秀骨清像”式的佛教绘画和雕塑,是由顾、戴的变革创造加上陆探微的发展完善而形成的。^[13]“秀骨清像”的风格与当时社会风尚与审美趣向有着密切的关系。汉晋及南北朝,已广泛流行于士族之间的人物品藻风气日趋兴盛。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手执麈尾,口吐玄言的名士,模仿的是他们服药、喝酒、赋诗、清谈的情志与风度。以为高逸,相因成习。在《世说新语》和《晋书》中有许多对这类人士的品评和赞誉。如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阮籍“傲然独立,任性不羈。”阮瞻“神气冲和而不知人间所在,举止灼然恬淡,神色其闲畅。”王恭“濯濯如春月柳”。陆机“风鉴澄爽,神情俊迈。”等。这类“秀骨清像”之美遂成为士大夫所向往和追求的最高标准,也正是艺术作品表现的理想题材。

在文物考古中也发现了一些东晋及南北朝具有秀骨清像风格的文物。如20世纪60年代,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南京及丹阳出土了多幅“竹林七贤”题材的砖印壁画。^[14]画面人物各具特色:嵇康端坐抚琴,傲睨天地万物,那种鄙夷世间污浊的孤傲,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戎倚几侧卧,随手舞弄如意,高傲的神姿,如瑶林琼树;刘伶低头捧杯,沉浸于醇酒的芬芳之中,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向秀斜倚树干,闭目凝思,神情萧索。其他如阮籍、阮咸、山涛等人,无一不神态栩栩,气韵生动。1986年,在山东济南东八里洼墓发现了可能为“七贤”的北朝高士图壁画。壁画中的高士,宽袍大袖,袒胸裸足坐于树(竹)下的席上,旁置壶、盘、杯等酒器,悠悠自得,作饮酒状。^[15]1958年,在南阳市邓县学庄村画像砖墓发现了南朝彩色画像砖。画像构图紧凑、形象生动、线条流畅,人物造型顾身蜂腰,有着南朝人物画“秀骨清像”之特征。“竹林七贤”砖印壁画及邓县画像砖中人物的刻画手法、风格、线条、神态等,都可在顾恺之《洛神赋图》、《女史箴图》卷等摹本中找到类似的形象,并可看出在艺术造型方面的继承关系。^[16]推测“竹林七贤”砖镶嵌壁画的最早粉本作者可能为顾恺之等。“秀骨清像”画风影响之广,可见一斑。

随着孝文帝迁洛的汉化进程,鲜卑贵族和汉族仿效南朝士族的风气日甚,俨若南方世家。南北交流的社会文化风气对北方佛教造像艺术,特别是对石窟造像风格有着直接的影响。佛教造像瘦削的身躯、不可言说的微笑、洞悉哲理的神情及摆脱世俗的潇洒风度,正是门阀士族审美理想在该方面的现实体现。龙门石窟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魏字洞等北魏后期作品,都有着当时风行的“秀骨清像”风格。古阳洞第二阶段雕造的第二排大龕中的交脚弥勒像,以及在大龕之间及左右壁上直至窟顶加刻的许多小龕中的释迦弥勒像,都是典型的躯体修长瘦削的“秀骨清像。”宾阳中洞以后的洞窟,“秀骨清像”的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佛像身着褒衣博带袈裟,面相清朗秀美,嘴角上翘略呈笑意,神秘而恬静,两肩瘦削,身体扁平,为层层叠叠的衣服所淹没,衣褶稠密华丽,线条流畅。佛身边的菩萨弟子,也都面相清秀,表情含蓄温柔,颈长腰细,体现出风神秀骨的飘逸之气。这种风格也普遍出现于当时中原其他一些石窟中。^[17]中原地区的一些单体佛教造像也多有类似风格。如北魏景明四年(503)的张难扬造像,主尊面相清瘦,颈部细

长,胸部扁平,两肩削窄,身躯修长。二胁侍菩萨与主尊面相类似,清癯秀丽。正始二年(505)尚齐八十人等造像,主尊和胁侍平胸削肩,身材颀长。熙平二年(517)孔惠超造像亦呈现出端雅秀丽的“秀骨清像”之风貌等。^[10]¹⁰

青天河摩崖经像中的菩萨形象,除了其“秀骨清像”的中原风格外,在其身上同时还保留有西域特色。如鼻高目深,唇上有八字形髭等。这类形象,在我国西部的石窟中多有发现。如5世纪至8世纪中叶的新疆库车库木吐拉石窟新2窟中的彩绘菩萨,其唇上有髭;^[18]敦煌第260窟中心柱南龕下层西侧的北魏菩萨彩绘立像和第285窟北壁东侧下的西魏菩萨像,^[19]超凡脱俗,“秀骨清像”,一派南朝名士之风度,菩萨面部胡须均与青天河摩崖观世音像相似。

在印度石窟中,根据佛经的教义,菩萨的形象既有善女子相,更多则为善男子相。其原型为古印度的一些上层贵族,这类人养尊处优,生活丰裕,形象丰腴俊美,在菩萨造像的嘴唇旁画几道髭鬚,以表示他们的性别。圣众中男女其他一些生理特征也非常明显,男者面相丰圆、肩宽腰壮、强健有力。女者圆脸、尖眼、长眉、厚唇、丰乳、细腰大臀等。石窟艺术传到我国新疆、敦煌一带后,由于当地人文风情的影响,裸体形像已大为减少以至逐渐匿迹,但菩萨的一些男性特征还有所保留。青天河摩崖刻经菩萨造像保留这类特点,应是这个时期西域式样与中原模式的结合形式。然据目前资料,中原地区极少见到面带胡须的佛和菩萨造像出现,似可认为这种带胡须的菩萨图像尚未被中原的佛教信徒所接受,在中原地区没有流行开来。^[10]¹¹该线刻观音经像的刻文中,记载厉威将军苏建曾任覆津太守。覆津,地名,在今甘肃省武都县。甘肃地区是佛教东渐的必经之地,也是接受孝文帝迁洛后中原佛教艺术向周边辐射的重要地区。作为修治丹道的总指挥官,工程期间及竣工之后乞求菩萨佑护,在当时应是一件十分重大且神圣的事情,选用西域敦煌一带的菩萨形像作为粉本刻绘供奉,当属正常之举。线刻菩萨的粉本很可能是苏建由西北所带之物。

(四)悬谷山千佛洞及千佛题材

沁阳悬谷山摩崖石刻千佛洞的千佛题材,是研究我国千佛信仰的实物资料。千佛题材是大乘佛教思想的产物,大乘佛教经典认为,在过去庄严劫、现在贤劫、未来星宿劫三大劫中,各有一千人成佛。

合称三世三千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可成佛。”三世三千佛信仰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抄写、称颂、礼敬佛名号等来解脱诸苦,累积功德。

千佛是佛教经典中记载的重要对象,在佛教造像艺术中自然得以广泛的表现。在佛教洞窟、造像碑、造像塔中,千佛是常见的基本造像题材。其表现形式多为一排排横竖排列的小佛龕,布满石窟的中心塔柱、壁面或造像碑的碑身等,数量无固定,有的成千上万,有的几百或几十。虽然千篇一律,但为洞窟或寺院笼罩了一种神秘的宗教氛围。据20世纪80年代的统计,在71个较有名的佛教石窟中,被称作千佛洞的就达33个之多^[20]敦煌石窟保存有世界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千佛造像,以壁画为主。在莫高窟的492个洞窟中,大多数窟内都会有千佛。我国现存有确切纪年的最早千佛图像,是炳灵寺第169窟东壁西秦(385—431)时绘的说法图。北朝时的石窟千佛图像还有新疆鄯善吐峪沟第44窟东、南、北壁上段绘的千佛;武威天梯山石窟第1窟北壁底层北魏时期所画的千佛;张掖马蹄寺、金塔寺的千佛画;酒泉文殊山千佛洞的千佛画;吐鲁番雅尔湖第7窟的千佛画;麦积山千佛廊、万佛堂雕刻的1337身千佛;云冈石窟20余个洞窟的千佛图像;龙门石窟古阳洞、莲花洞、魏字洞和巩县石窟的千佛图像;响堂山和邯郸水浴寺石窟西窟四壁的千佛图像等。在石窟千佛题材的影响下,还有许多千佛造像塔、造像碑等。^[21]

沁阳悬谷山千佛洞建于隋前期或更早,其造像内容可以反映北朝佛教思想。该千佛之间横、竖俱有界格相隔。在千佛的每个佛龕壁面立颊上刻出佛名,这种形式在其它以千佛为题材的造像中较为少见。值得注意的是,千佛的排名次序是有规律的,是按竖行自上而下排列,而且逆时针旋转。排名始于东壁左上角,自左上角始第一行,前三尊千佛题名已毁,第四尊像侧尚存残字题记“释迦牟尼”三字,第五尊像侧尚存残字题记“弥”字。“释迦牟尼”即释迦牟尼佛之残字,“弥”即弥勒佛之残字。释迦佛系贤劫千佛中第四位出世的佛,也称现在佛。弥勒佛是继释迦佛后第五位出世的佛,被称作未来佛或当来佛。该窟所刻千佛题名,与《贤劫千佛名经》列举的一些千佛名多有相合。^[3]

关于千佛名号榜题和排列顺序,在莫高窟第254窟北魏千佛画中也有体现,该千佛画共绘有佛像1235尊。榜题中多是“庄严劫(过去)千佛”和

“星宿劫(未来)千佛”的题名。千佛榜题的名号也有排列顺序,过去世千佛在东壁门南起部位最适中的下起三排开始,经南壁至西壁中部止,按先后顺序排列。未来世千佛从西壁下四排中部向北,又以大致的先后顺序排列。构成一个按顺时针方向旋转的“环”。^[20]沁阳悬谷山摩崖石刻千佛洞贤劫千佛题名的排列顺序与莫高窟第254窟千佛榜题名号排列顺序,对我国千佛题材及千佛名号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在距沁阳悬谷山摩崖石窟东约30公里的博爱石佛滩摩崖造像中,也有隋代的千佛简化表现形式,如在二区六层排列有50个像龕,其中南段并列有9个像龕。可见千佛信仰在该地的兴盛。^[5]

(五)关于药师佛造像

药师佛造像是沁阳悬谷山窄涧谷摩崖造像中保存最为完好且体量最大者。在已发现的唐代药师佛造像中也较为少见。

药师佛,又称药师如来、药师琉璃光如来、大医王佛、医王善逝、十二愿王等。为东方净琉璃世界教主。由于药师佛成佛时曾立下十二大誓愿(又称十二上愿),誓愿为众生解除疾苦和灾难、求得现世安乐,拔除苦难,致福众生。因此,人们也常称其为“消灾延寿药师琉璃光佛”。

信仰药师佛,只要造立佛像,就能所求如愿,《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度经》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发心造立药师琉璃光如来形像,供养礼拜,悬杂色幡盖,烧香散华,歌咏赞叹,围绕百匝还本座处,端坐思惟念药师琉璃光佛无量功德。若有男子女人,七日七夜菜食长斋,供养礼拜药师琉璃光佛,求心中所愿者无不获得。求长寿得长寿,求富饶得富饶,求安隐得安隐,求男女得男女,求官位得官位。”由于这诸多好处,药师佛在民间影响很广泛,许多寺院的大雄宝殿内,居中供奉释迦牟尼佛,左边供奉西方阿弥陀佛,右边供奉的就是东方药师佛。寺院还常有专设的药师殿(俗称药王殿),以药师佛为主尊供奉等。

药师佛造像,多保存于石窟中,现存最早的有炳灵寺169窟第6龕建弘元年(420)的药师佛像。还有北魏云冈石窟第11窟西壁上部小龕的药师佛禅定像;龙门石窟古阳洞南壁孝昌元年(525)所造的药师像与弥勒、观音三尊像;^[22]宁夏须弥山石窟第1窟主室北壁低坛上的唐代药师佛像。该像高4.85米,面相浑圆,身着交领袈裟,左臂曲置胸前,手中似托一药钵状物,右手上举,作说法印,足踏仰

覆莲座;^[23]陕西药王山唐摩崖造像中(编号32)的一佛二菩萨组合,主像应为药师佛,结跏趺坐于双层莲花座上,身着通肩大衣,波浪纹发髻,左手持钵置于腹际,右手拈一粒药丸举至胸前。^[22]新疆伯孜克里克石窟第29窟南侧一铺药师经变,绘药师佛、二大菩萨、十二神将及诸圣众;库木吐拉石窟第16窟主室北壁绘药师经变,存有榜题;克孜尔石窟附近的阿艾石窟也有盛唐绘的药师单尊像;敦煌莫高窟壁画里有550余尊药师像,敦煌石窟药师经变的数量高达110铺之多。^[24]四川资中、大足、安岳、巴中等石窟中也发现有较多的唐宋时期的药师造像等。^[25]此外,考古发现还有一些药师佛的石刻造像。河南浚县北齐武平三年(572)造像碑中的药师佛像;^[26]郑州博物馆隋开皇二年(582)三层四面造像碑中的行禅定印龕佛,旁边有“药师琉璃”题记;陕西铜川市耀州区博物馆藏唐神龙三年(707)青石药师佛立像。造像高约1.8米,身着圆领通肩大衣,右肩斜披袈裟,跣足立于仰莲座上,左臂弯屈,手掌垂伸,掌心握药丸,右臂前伸,手掌上举;西安碑林博物馆唐四面石佛塔构件,北面主像结跏趺坐,身着通肩大衣,双手持钵于腹前,应为药师佛。^[22]

药师佛的形象不甚统一。一般左手执持药器(又作无价珠),右手结三界印,身穿袈裟,结跏趺坐于莲花台上;有的药师佛形象是,左手持一只内可盛甘露的钵,右手以拇指和食指持一颗药丸;有的造像未塑钵和药丸,仅以手势表示;有的塑像则是手持法器。窄涧谷摩崖石刻佛龕所雕的药师佛,立于莲座之上,左手托一药钵,右手斜持锡杖,杖端雕一坐佛。这类造像很值得注意,日本佛教资料曾提到“唐本”中记载的药师佛形象,其主要特征就是“持钵、锡杖”。锡杖是佛教徒日常器具之一。东汉安世高译《大比丘三千威仪》卷下详列了25种使用锡杖的原因和使用方法,其中前3条为使用锡杖的原因:一者,为地虫故;二者,为年老故;三者,为分卫故。即为驱逐野兽害虫和年纪老迈者以及为保卫自身使用等。《续高僧传》卷第十六记载有北齐高僧僧稠使用锡杖的故事:僧稠前往怀州(今沁阳)西王屋山(今济源境地)修法途中,听闻两虎交斗,咆哮声响震动山岳,僧稠即以锡杖途中调解,于是两只老虎便各散而去。在佛教逐渐壮大之后,持锡杖的形象遂定格于药师佛,作为和其他诸佛身份的区别,并成为一种定式。^[22]沁阳窄涧谷太平寺的信众“立召良工,雕磨斯像,日加精勤,时无懈

息,庄严具相,真如恩布之容”,以持锡杖、托药钵的药师佛形像,专设石龕以供奉。可谓唐代药师佛信仰在太行山南麓兴盛的体现。持锡杖、托药钵的造像更是研究药师佛形像的珍贵实物资料。

三 结 论

焦作地区的三处石窟(摩崖石刻)属于中小型石窟一类,其学术价值十分重要。

1. 北魏青天河摩崖观音经像《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第二十四》,是目前发现有确切记年的,时代最早的同类刻经。线刻菩萨图像是西域佛教与中原佛教的结合形式,对研究西域和中原佛教艺术的融合与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

2. 青天河摩崖菩萨线刻图像、沁阳悬谷山千佛洞的千佛及大体量的药师佛造像等,反映了千佛题材、观音信仰,以及药师佛信仰在当地的兴盛。持锡杖、托药钵造像本身是研究药师佛形像难得的实物资料。

3. 沁阳悬谷山太平寺、博爱石佛滩隋代摩崖造像题材、风格及雕刻手法与太行山东麓的安阳灵泉寺和邯郸响堂山石窟颇为相似,有互相影响之因素。石佛滩隋末摩崖造像雕凿时间集中,题材、风格一致,是迄今河南省中小型石窟中发现的最大一处隋代造像群,对区别隋唐造像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4. 这三处石窟(摩崖石刻)及太行山南麓其他一些石窟遗迹,分布在平城至洛阳和洛阳与邙城的交通线上,是晋豫沿线及其以东地区北朝隋唐佛教石窟分布区域的重要内容。它为中国佛教石窟分布的区域划分,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参考文献:

- [1] 释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26.
- [2]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247.
- [3] 王振国.河南沁阳悬谷山隋代千佛洞[J].敦煌研究,2004(4).
- [4] 温玉成.豫北佛教文物丛考[C].河南文物考古论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502-511.
- [5] 河南省古建研究所,博爱县博物馆.博爱县石佛滩隋代

摩崖造像调查简报[J].中原文物,1992(1).

- [6] 罗火金.河南博爱北魏摩崖题刻与古丹道研究[J].文物世界,2003(6).
- [7] 李海波.妙法莲华经[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3-4.
- [8] 李裕群.邙城地区石窟与刻经[J].考古学报,1997(4).
- [9] 王振国.关于河南省林州市洪谷寺千佛洞的造像与刻经[J].敦煌研究,2003(5).
- [10] 王景荃.河南佛教石刻造像[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10.
- [11] 王 洁.二横山天然大石佛经像碑考——兼与龙门同类经像之比较[J].敦煌学辑刊,2003(2).
- [12] 金 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24-194.
- [13] 陈传席.中国早期佛教艺术样式的四次变革及其原因[J].美术研究,1994(1).
- [14] 韦 正.南京西善桥官山“竹林七贤”壁画墓的时代[J].文物,2005(4).
- [15]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J].文物,1989(4).
- [16] 柳 涵.邓县画像砖墓的时代和研究[J].考古,1959(5).
- [17] 赵继学.论“秀骨清相”风格的形成[J].美与时代,2007(6).
- [18] 周菁葆.新疆石窟壁画的题材与艺术特色[J].艺术百家,2010(4).
- [19] 徐建融.菩萨造像[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21,26.
- [20] 宁 强,胡同庆.敦煌莫高窟第254窟千佛画研究[J].敦煌研究,1986(4).
- [21] 贺世哲.关于北朝石窟千佛图像诸问题[J].敦煌研究,1989(3).
- [22] 白 文.关中唐代药师佛造像图像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 [23]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北京大学考古系.须弥山石窟内容总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28.
- [24] 党燕妮.晚唐五代宋初敦煌民间佛教信仰研究[D].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09:57-58.
- [25] 胡文和.四川摩崖造像中的药师变和药师经变[J].文博,1988(2).
- [26] 周 到,吕 品.河南浚县造象碑调查记[J].文物,1965(3).

责任编辑:卫 华